

“洪范九畴”： 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生动体现

□ 黄 畅

《洪范》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尚书》中的一篇，主要阐述了古代治国的9种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被统称为“洪范九畴”，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的重要文献，其内容和影响至今仍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关于该篇产生的历史背景，《尚书》有言：“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相传大禹从天那里得到了《洛书》，《洛书》中包含了《洪范》的核心内容，即从“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的65字，箕子根据《洛书》向周武王阐释治国之道，最终形成了《洪范》。关于《洪范》的成书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它成书于西周时期。

《洪范》提出的“洪范九畴”是9种治国的根本大法，包括：（一）五行；（二）敬用五事；（三）农用八政；（四）协用五纪；（五）建用皇极；（六）乂用三德；（七）明用稽疑；（八）念用庶徵；（九）猷用五福，威用六极。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和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世界观和宇宙观

《洪范》第一畴“五行”论述了水、火、木、金、土的性能和作用，证明“五行”理论在先秦时期已经发展成熟。它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成为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重要概念，代表着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不仅说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且对人类生存的客观世界的生成问题有了初步总结。第二畴“五事”指君王和臣子在治理国家时应有的行为和态度，“五行”相对、言、视、听、思。它与“五事”相对应，进一步强调了“五行”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例如“貌”与“水”相对应，因为水的特性是润下，象征着谦卑和柔和；“言”与“火”相对应，因为火的特性是炎上，象征着

光明和温暖。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体现了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的联系，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第四畴“五纪”（“五纪”者，五事为天时之经纪也）指出了岁、月、日、星辰、历数的重要性，确立了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所用的时间，确定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个重要节气。纪时方法的确定，不仅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结果，也是对农业社会中时间管理的指导，体现了古代宇宙秩序和自然规律的尊重，代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水平。“五纪”属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领域，并且与人类社会的礼、义、爱、仁、忠5种德行相对应，为研究古代中国人人关系、宇宙观、天文历法以及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五行”“五事”“五纪”反映了古人“尚中”的观念，这个“中”的原则与中数“五”相匹配，体现在君王应以中道治国，建立一个民可效法的最高标准。

《洪范》包含着古人对历史发展过程、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总结，体现了夏商两代思想文化特征，为后世中国古代哲学家解释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国家治理的全面思考

《洪范》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第三畴“农用八政”强调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这里的“农”字，既可以解释为“厚”，即厚植民生，也可以解释为“勉”，即勤勉从事。“农用八政”展现了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食（粮食的生产和分配）、货（物品交易和流通）、祀（祭祀活动）、司空（负责土地和公共工程的管理）、司徒（主管教育和民众的教化、选拔和培养官员）、司寇（负责司法和刑罚）、宾（涉及对外交往和宾客接待）、师（军事），涵盖了从经济、社会、文化到国防等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这8项政策的实施，旨在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国家的稳

定、繁荣和人民福祉。第八畴“庶徵”指的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预测农业年景和收成，是用以指导农业生产 and 国家治理的一种方法。通过对雨、晴、暖、寒、风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统治者和臣民可以对农业生产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准备，比如决定播种时间、灌溉量、防虫害等。“庶徵”将自然和人事联系起来，认为执政者施政的好坏会影响到天象变化。

确立了圣贤治国的
道德模式

在夏商时代，占卜是统治者的一种重要决策手段，在国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洪范》第七畴提出了“明用稽疑”，稽疑的过程涉及使用卜筮等占卜手段来征询神灵的旨意，帮助君王作出“合理”的决策。具体来说，君王在面临重大事项需要作出选择时，有时会通过卜筮方式来决定，同时也会咨询卿士、庶民，结合多方意见和占卜结果来作出最终决策，体现了中国古代君王兼顺民意与民意的治国理念。第五畴“皇极”主张“皇建其有极”，赏罚分明以使臣民顺服，君王应当建立的统治准则，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最高标准。“皇极”强调的是君主的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中正之道，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体来说，君王应当建立中正之道，作为统治的准则；君王的行为和决策应当符合道德标准，成为民众的楷模；君王应当以民为本，关爱百姓，实现政治公正与社会和谐。“皇极”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中重视君主德行和民本思想的核心观点，通过君王的德治可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六畴“乂用三德”提出了“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平和、公正、不偏私，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坚定、果断的方式治理国家，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以温和、宽容的方式治理国家，通过柔和的手段引导和教化人民。“正直”“刚克”“柔克”体现了

治国的哲学思想，强调要根据不同情境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态度，既要有坚定的决断力，也要有适当的柔和与宽容，刚柔并济、宽猛结合。第九畴“餐用五福”意味着君王应当引导国家和人民追求五福（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而“威用六极”则是说君王应当以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为警戒，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这些不幸的状态。这两个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君王治理国家时应当追求的理想状态和应当避免的不良后果。

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

《洪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其思想和理论对后世的哲学、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对其真伪、成书年代的讨论，推动了文献学方法的发展，其思想和内容也不断被后世阐释并加以继承，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古代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框架之一；“庶徵”概念，即日、月、星辰等天象变化与人间政治行为的相互影响，为汉代“天人感应”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被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被其视为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的至高标准，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范》所包含的九畴体系，反映了古人敬天、重人、确立圣贤治国的道德模式。由此，“民惟邦本”的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模式。



元,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受当前镇级管理体制的局限,普遍存在要素配置与经济体量、财政能力与支出责任、人口规模与管理效能、执法权限与管理需求之间的不协调不匹配困境,制约着特大镇内发展潜力挖掘与释放。要统筹推进特大镇扩权赋能改革,赋予特大镇具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破解“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困境。深化特大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县镇同权”综合改革,拓宽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范畴,构建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体系,建立灵活高效的人员编制与任用制度,提高集中审批服务与综合行政执法效能。深化特大镇财政体制改革,鼓励在收支范围划分、收支基数核定等方面,率先探索新的分成模式,建立财政超收激励机制,超收部分全额返还特大镇,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特大镇财政管理体制。深化特大镇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探索建立与县城统一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加快特大镇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将省级公共服务平台对大镇服务事项延伸至特大镇。加大对特大镇的政策支持力度,以政策集成形成改革强大合力,确保特大镇享有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土地、金融、技术等支持政策,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特大镇汇集,将特大镇打造成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语出《韩非子·喻老》，意思是谨慎地对待容易解决的事，从而避免难以解决的事，慎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从而避开大祸。

《韩非子·喻老》篇中，韩非引用了千丈长堤因蚁蜂打洞而崩溃、百川居室因烟囱裂缝致出火星而被烧毁、蔡桓公因讳疾忌医而病亡等例子，论证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道理。他认为，“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即有形制的东西，大的一定是从小的发展起来的，经历久远的事物，多的一定是从少的发展起来的。由此，“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想要解决困难的事情，就必须它在还容易解决的时候着手，要治理大事，就必须从细节上保持谨慎。

目光长远的人，会在危难刚刚露出端倪的时候就着手纠正，以此避免更大的祸患。战国时期，医学家秦越人由于医术高明被人称为“扁鹊”。他告诉蔡桓公有点毛病需要治疗，蔡桓公却不予理睬，导致疾病由汗毛孔发起到肌肉与皮肤、再到肠胃，最后病入骨髓时，才想要治疗，然而为时已晚，最终失去生命。扁鹊说，毛病在汗毛孔，用药汤浸泡、用药物热敷就能奏效了；在肌肉与皮肤之间，使用金针、石针来针灸就能奏效了；在肠胃，服用火煎的汤剂就能奏效了；在骨髓，就无药可救了。即便是扁鹊这样的神医，也要在病症尚且轻微时就治疗，一旦疾病深入骨髓，“虽有扁鹊，命夫之巧，犹不能生也”。总之，祸患都有发展的过程，在危难刚露出苗头且容易采取措施的阶段，就应该发现问题并及早加以处理，不能像蔡桓公那样讳疾忌医、不听劝谏，最终酿成大祸。

细节决定成败。《群书治要·刘廙政论》载：“善为屋者，知梁桷之不可以不固，故栋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备，故众桷与之共成也。善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阙也，故无阙而不备；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善于建造房屋的人，知道要将栋梁和它上面的短柱建得稳固，知道每一个部件都很重要，不能缺少东西或粗制滥造，因而建造的房子能够长存不坏；懂得治国理政的人，知道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或缺，任何正确的意见都不可轻易遗漏，所以能够时时刻刻做好准备，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反之，自认为是小事小节、细枝末节，而常常疏于修正、防范，长久下来，就会导致整体上全盘皆失。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形象地阐明了堤于微、防于小、杜于渐、作于细的道理。《道德经》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重小处、重细节、重微末，谨慎对待小事、不败小节，事业才能走向成功。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深刻诠释了部分对于整体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每个部分都会影响整体的成败。要认真对待部分和细节，保持“慎易”“敬细”的态度，把每步路都走扎实，把每个环节都抓好，充分发挥每一个部分的最大力量，方能避免整体上的重大风险、危难，实现整体的最优解，让事业更加持久、行稳致远。

中国古人历来重视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周易·系辞传》中有“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荀子》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群书治要·文子》亦有“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轻小易，微小事，以至于大患”；《资治通鉴》记载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时言，“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这些都阐释了见微知著、敬小慎微、居安思危的道理，强调对容易的、细微的事物保持关注和重视，方能避免危难、远离灾祸。

“慎易”“敬细”，需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兢兢业业、慎始慎终。《周易》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才德出众的君子，应当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终日不懈、慎独慎微、严谨持正，方能避免灾祸与过失。《群书治要·淮南子》记载，尧帝设置专供直谏的大鼓，舜帝竖起专供人议论书写的木牌，商汤设立专门掌管直言进谏的官员，周武王刻制专门用来警戒自己的铭文，赞叹“夫圣人之为善也，无小而不举；于过也，无微而不改。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圣人之所以伟大，在于能够谨慎地对待善举和过错，认真履行每一个小的善行，仔细改正每一个微小的过错，小心翼翼、日日谨慎、始终如一，才修养了

刘余莉 邢梦潺

崇高的品德。

“慎”“敬”，需要具备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美德。古语有言，“满招损，谦受益”，自满不视缺点就容易忽视细节而导致大祸。战国时期政治家淳于髡发现邻居家灶炉烟道太直，且柴草又堆放在灶旁，就劝邻人居说：“这样早晚会发生火灾”。邻居并未听从他的劝告，而后灶火落下，燃及柴草而烧着了房子。这则“曲突徙薪”的典故警示人们应当谦虚谨慎、听从劝导、慎易敬细，方能避免祸患。唐贞观二年，高昌王曲文泰准备入京朝见皇帝，西域各国都想乘曲文泰入朝的机会，派使者给皇帝进贡，太宗命文泰的使臣庆恒纪前去迎接西域各国使臣。魏徵劝进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乱的创伤还未恢复，如果稍有劳役，自己就不得安宁。”往年文泰入京朝见皇上，所经过的州县，尚且疲于供给，何况又加上西域各国的使臣。假如让西域的人以商人的身份来往，边地人民就会因此得利；如果作为宾客前来，国中就会消耗大量资财而深受其害。”唐太宗听从谏言，终止了此事。将宾客变为商人，虽只是细微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正是因为唐太宗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美德，才能与群臣共同洞察细微的隐患，进而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实现“贞观之治”。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之所以难，是因为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正如《吕氏春秋·慎小》所言，“人之情，不蹶于山，而蹶于垤”，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小土堆绊倒，“是故人者，皆轻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因此，人们处事更加需要严谨细致、不弃微末、精益求精的态度，穷尽各种可能，关注容易忽视的细节，才能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老子有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论何事，总是在最初安静的状态下容易把握，在还没有征兆的时候容易矫正，在还没有很明显的时候容易化解。因此，解决问题，要在问题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发现端倪、治理动乱，要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提前关闭祸乱之门。

(上接1版)

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机制。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以成员权为基础的财产权利，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大量农户长期处于“人地分离”“人户分离”状态，农民“三权”退出机制不健全导致维护成本高、侵害农民权益现象日增多。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坚持依法依规、风险可控、稳慎推进、试点先行等原则，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机制，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认定机制，严格限定农民“三权”有偿退出的门槛和退出程序，精准识别具备退地条件和退地意愿较强的农民，申请“三权”退出农民要在城镇有固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和持续的非农就业能力等。创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模式，因地制宜探索“三权”永久退出、暂时性退出、整户退出、部分成员退出、“三权”同时退出、单项权利退出等多种退出方式，精准匹配不同农民群体多元化需求。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补偿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民“三权”价值评估体系，探索分批次补偿、承包地宅基地折价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综合考虑“三权”现实收益、未来价值等多种因素，为农民提供多样化补偿选择。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风险防范机制，设立“冷静期”和“反悔机制”，允许已自愿有偿退出“三权”的农民在一定期限内以一条

件赎回，确保农民在工农之间“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

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优化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基本形成了以超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但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仍然存在链接不紧、协作不强、分工不优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大中小城市过度吸收周边城镇资源要素,但辐射带动力不足,小城镇人口吸引力和成长性较弱,融入度参与度不强。要引导不同等级规模城镇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同联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健全城市规划体系,科学确定城市规模和开发强度,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加强财税、金融、土地、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为大中小城市各类资源要素向小城镇流动提供政策支持。完善产业联动推进机制,合理确定区域产业分工,疏解大城市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鼓励中小城市、小城镇按照自身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产业联动发展。提升网络化联系水平,推进交通互联互通,以高铁、高速公路等为骨干网络,提高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交通联系便捷度,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顺畅流动与高效集聚;引导大中小城

市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资源向小城镇延伸，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都市圈同城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我国高度重视都市圈建设,培育了一批经济总量大、发展活力足、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但与此同时,都市圈内城市之间产业链关联配套不够、区域协作分工不足、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加快构建智慧高效治理体系,全面提升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创新统筹协调机制,建立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形成联席会议制度和常态化协商制度,强化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完善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产生的税费优惠、税收共享、征管协调政策。健全资源共享机制,构建都市圈交通网络同城化体系,加强公路、城际铁路、快速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发挥公共交通对于产业发展、人口集聚的先行引导功能,破解职住分离“潮汐交通”等通勤问题;强化都市圈公共服务同城化供给,以“互联网+”为手段,打破地域限制,打通公共服务资源壁垒;探索建立跨区域用地指标统筹等机制,提高建设用地配置效率。强化生态共建联防联治,加强都市圈大气、水、土壤等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环境监测信息监管和共享机制、生态问题预警和联合防御机制,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格局。

深化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特大镇作为地理空间上的独特单